

中國

現代小說
名著
1分鐘

楊昌江 主編

學苑出版社



中国现代小说名著 一 分 钟

杨昌江 主编

学 苑 出 版 社

中国现代小说名著一分钟

杨昌江 主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992 1/32 印张：14.75 字数：330千字

印数：00001—7000册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077-0182-4/G·103 定价：6.30元

序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概述

杨昌江

所谓中国现代小说，是指从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密不可分的，它因这场革命而产生，同时又对这场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动员推动作用。因而，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中国现代小说的众多作品，尽管它们有各自的思想内容追求，而它们思想内容的主流则是反映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尽管它们对许多创作方法都作过尝试，而它们创作方法的主流则是真实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目的现实主义；尽管它们在艺术形式方面有纷繁多样的风格和流派，但其主流则是创造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新形式新手法。正是上述这些基本性质赋予中国现代小说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还从未曾象中国现代小说这样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中国现代小说有三十二年发展历史，粗略说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相一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十年（1917—1927），第二个十年（1927—1937），第三个十年（1937—1949）。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十年中国现代小说

发展的概况和特点作一些说明。

第一个十年（1917—1927）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初创期，有如下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鲁迅的小说奇峰突起，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使鲁迅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无人伦比的伟大奠基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极大地鼓舞了鲁迅，促使他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又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著名作品，

“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铺垫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这些小说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作了坚决彻底的否定，用“吃人”对其本质作了形象犀利的概括，同时又怀着挚爱之情，沉痛地描写了下层民众在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摧残毒害下所产生的种种精神病态，希望他们迅速觉醒来扫荡这“吃人”的旧世界。鲁迅是以小说揭示社会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自觉参与改良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工作，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呐喊助威，因而他的小说被人称为“呐喊小说”。与此同时，鲁迅的这些小说不但开创了现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伟大文学主流，而且打破了旧的章回体小说的体式，在多方面继承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传统的同时，又吸取外国小说的有益营养，在结构布局、叙述方法、表现手法、语言运用上大胆创新，为中国现代小说探索崭新的艺术道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总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高度成熟，在当时如奇峰突起，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批青

年作家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使他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奠基人的历史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人可以比并的。

二、社团和流派大量涌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竞相发展。在“五四”运动中，人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封建复古派的理论批判上和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上，小说创作的实践还比较少，数量和质量都不够，这种情况要延续到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一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新文学社团纷纷成立，文学刊物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小说创作的队伍才真正形成。作家们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农运动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等现实斗争的教育和锻炼，他们的创作才在数量和质量上迅速提高。

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社团和流派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茅盾、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冰心等。他们高举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旗帜，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问题”，他们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为人生派”。他们主张客观地写实地反映生活，“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创作了不少所谓“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以“人生的真谛究竟是什么”作为思考的中心问题，想通过诅咒黑暗现实，鼓吹社会改造，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重视人才，去回答社会生活提出的这个问题，指导人们怎样对待人生。例如，冰心的《超人》主张人生的指针是“爱”，庐隐的《海滨故人》主张人生的指针是“憎”，许地山的《缀网劳蛛》赞扬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宽容不争的人生，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讽刺琐屑自私、怯懦苟安的人生。

创造社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

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他们高举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旗帜，崇尚“自我”，鼓吹“个性”，认为文学要表现“内心的要求”，并追求艺术的“全与美”，被人称为“为艺术派”。他们强调文学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创作了许多以作家自己日常生活作素材，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这些小说被人称为“身边小说”。这类小说强调作家的自我表现，大胆真率地抒写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如郁达夫的《沉沦》描写主人公在异国得不到爱情而产生的变态性心理，和希望祖国强盛起来的爱国情绪，在主情主义文学的背后，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身影。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表现作者贫困窘迫的生活，汪洋恣肆的文笔把满腔悲愤挥写得淋漓尽致。

除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社团和流派。如受到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影响的一批作家形成的“乡土文学派”，主要成员有王鲁彦、冯文炳、许钦文、台静农等。他们是受生活驱迫离开故乡农村而侨居异地的作家，所写作品大抵都是植根于故乡乡土且隐现着乡愁的小说。如王鲁彦的《黄金》，写农村小有产者经济败落时所受世态炎凉的痛苦；许钦文的《疯妇》，写农村封建婆媳关系之难堪。这些作品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全力表现农村题材，关心农民问题，是“为人生派”小说一种有重要意义的发展。又如蒋光慈等人的“普罗小说派”，实际上这就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派，他们强调小说创作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表现阶级意识，寄托革命理想。例如，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写一个佃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在经历了曲折的人生旅程之后，终于投身于革命事业，且为此而在战场上献出了生命。其情感宣泄式写法，说明“普罗小说派”与创造社的浪漫主义风格很接近。

三、在众多的题材中，集中突出地体现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主题。这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决定的。一般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其锋芒所向，是要打破人们千百年来所受封建思想的禁锢。因为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五四”时期的作家们普遍感到，离开社会思想变革的单纯的政权更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开展一场旨在改变群众精神状态的思想革命，才有可能进而确有成效地进行政治革命。而在当时的中国，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而是封建思想。思想革命的任务是清除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严重影响。鲁迅是自觉地、从总体上认识到这点的，因而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都贯穿着“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一基本精神。文学研究会作家冰心的《超人》、庐隐的《海滨故人》、许地山的《缀网劳蛛》，提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用理性的态度讨论人的价值问题，显示了对“人”的觉醒与解放的追求，是以个性主义冲击封建主义，反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和伦理观念。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如郁达夫的《沉沦》等，以大胆的性苦闷描写，表现了道学家讳莫如深的内容，是对旧礼教叛逆的声音。“乡土文学派”作家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冥婚陋俗，台静农的《拜堂》写寡妇与小叔子成婚所受社会非难，这些作品均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旧中国乡村在宗法制度下的闭塞愚昧生活景象，使人对封建主义产生阴冷憎恶之感。

四、工农劳动者和新式知识分子成了作品主要的描写对象。鲁迅曾说：“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

而从“五四”时期开始，在“劳工神圣”等民主观念支配下，现代小说里的主角人物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不是说过去的旧小说中没有表现过劳动人民或下层知识分子，而是说只有到“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中劳动人民和新式知识分子才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工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所谓唤醒民众，主要就是唤醒他们；而新式知识分子是社会最先觉醒的力量，有先锋桥梁作用。鲁迅笔下的阿Q（《阿Q正传》），冯文炳笔下的三姑娘（《竹林的故事》），许钦文笔下的双喜媳妇（《疯妇》），蒋光慈笔下的汪中（《少年漂泊者》），就都是工农劳动者。鲁迅笔下的狂人（《狂人日记》）和子君涓生夫妇（《伤逝》），庐隐笔下的露沙及其女伴们（《海滨故人》），郭沫若笔下的爱牟（《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笔下的“他”（《沉沦》），就都是新式知识分子。

五、创造了新的形式，运用了新的语言和新的表现手法。旧小说的章回体和话本体，被作家们摒弃，作家们根据表达新内容的需要，努力向外国小说借鉴，在小说体式上有了丰富多样的开拓。不过，这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方面，中长篇小说此时尚很少人创作。鲁迅的小说以其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对生活所作新颖的浓聚，而有别于有头有尾讲故事的旧小说，“一篇有一个新形式”。《狂人日记》的日记体，《少年漂泊者》的书信体，《漂流三部曲》的自传体，《海滨故人》的抒情体，《黄金》的叙事体，等等，都在体式的多样化上有别于旧小说。就小说语言而言，这个时期白话文的提倡和普及，是意义重大的历史性突破，作家们已全都用白话来创作，体现了语言工具的彻底革命，显示了文学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时代要求。就创作手法而言，创新也是极其多样的。例如，《狂人日记》、《超人》、《缀网劳蛛》等

篇，都在作品中表现哲理，且对哲理作形象化的暗示，这是作家们借小说表达自己对时代、社会、人生所作思考的审美方式之一；《伤逝》、《竹林的故事》、《沉沦》等篇，具有意境和情致，是诗对小说艺术的渗透，显示了抒情小说的成功。

第二个十年（1927—1937）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繁荣期，有如下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革命文学迅猛兴起，作品的战斗性迅猛加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统治集团逐渐在全国建立了法西斯反动统治，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引起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作为这一时期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的标志，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以鲁迅为主将，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强大阵营。小说作家们就是这个强大阵营的中坚力量，如鲁迅、茅盾、叶紫、柔石、胡也频、萧军、萧红、沙汀、艾芜、张天翼、丁玲等人，在这个时期都创作了大量革命文学作品，针对中国革命三大敌人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统治集团进行英勇的战斗。

例如，在第一个十年作家笔下的农民，几乎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他们愚昧、落后、不觉悟，但是到了第二个十年，作家们不仅描写农民们的困苦与挣扎，而且描写农民们的逐渐觉悟和农村中汹涌澎湃的土地革命浪潮。叶紫的《丰收》，表现了年青一代农民摆脱老一辈的顺民思想束缚而开始觉醒向往革命；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描写了大革

命前后的南方农民运动，明确展示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武装斗争的道路。又例如，在第一个十年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零余者”的形象，染有时代病的色彩，因找不到出路而有浓厚的感伤情绪，但到了第二个十年，作家们在描写大革命失败前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时代儿女”的经历时，除探索他们的革命出路问题外，甚至还写到了他们参加工农革命斗争后的自我改造过程，塑造了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形象。柔石的《二月》、叶绍钧的《倪焕之》、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都是这样，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量。

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衰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化，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兴起。在第一个十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原是两大竞相发展的流派，各自都拥有一批成就很大的作家，但到了第二个十年，以创造社为代表的作家们，都在现实生活的有力推动下，向现实主义靠拢，浪漫主义于是逐渐衰歇。我们把郁达夫这个时期写的《出奔》与前一个时期写的《沉沦》作一比较，就可明显地看出这点。上一个时期文学研究会作家王统照、许地山等人的作品，如《湖畔儿语》《缀网劳蛛》等，都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但这个时期所写的《山雨》《春桃》等，已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在创作方法方面，有不同于现代诗歌和现代戏剧文学的特殊性，即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无法与现实主义争雄，在现代小说领域中只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不断深化发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这个时期深化发展的标志，主要就是在左翼作家那里革命现实主义的迅速兴起，革命现实主义被明确提出作为左翼革命作家努力的方向，出现了在不同程

度上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的作家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茅盾的《子夜》、《春蚕》，它们通过对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自耕农老通宝破产命运的描写，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深入剖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痛击了托派和资产阶级幻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谬论，并以工农运动的描写，显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其他如丁玲、张天翼、叶紫、萧红、沙汀、艾芜、吴组缃等左翼作家，也都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作，以自己的作品宣传革命，教育群众。

在左翼革命作家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影响下，许多民主主义作家，如巴金、老舍等，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更加深化，虽然他们不能给人们指出求解放得光明的明确道路，但他们作品所显示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愈来愈鲜明，他们摈弃了旧的批判现实主义在揭露社会黑暗时寻求“补天”方策的改良主义立场，即对旧社会旧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愤怒的控诉和坚决的否定。

三、选材范围扩大，反映生活的领域得到充分的拓展。首先，作家所写人物的阶级阶层范围得到扩大，例如在第一个十年专门描写市民阶层生活的作品很少，而现在多了起来，有些作家，他们的作品甚至主要取材于市民阶层，把市民阶层的人物思想性格特点表现得维妙维肖。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城市个体劳动者祥子为买车而奋斗的三起三落经历作线索，牵连写出了一批城市下层人物的形象；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通过对公馆侍役老包“望子成龙”的描写，讽刺了小市民庸俗的一心向上爬的观念；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描写了青年学生樊家树与唱大鼓书的市民姑娘沈凤喜自由恋爱的悲剧，中间还穿插了市民关寿峰父女锄奸扶弱的故

事。又例如，在第一个十年表现资产阶级的作品几乎没有，而现在有了象茅盾的《子夜》这样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民族资产阶级性格命运的杰出作品。

其次，在第一个十年写反帝题材的作品很少，而现在写反帝题材的作品已居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们，以充满血泪和仇恨的新作，反映了故乡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屈辱和斗争，把抗日救亡的重大题材和主题及时地惊心动魄地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代表作有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

最后，就作品反映的地域而言，第一个十年的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或城市周围农村的生活，边远地区的生活很少得到反映，而到第二个十年，我们国家天南地北的世态人情、山川风物，都得到较为充分的描写，如沈从文的《边城》写湘西，艾芜的《山峡中》写云南边陲，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写川西，萧红的《生死场》写北大荒等等。他们的作品使人们能够全面地了解我们民族多姿多采的生活特点和文化传统。

四、在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是社会写实小说，象吴组缃的《樊家铺》、罗淑的《生人妻》等，脚踏实地逼近人生，准确精密地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表现了捕捉时代精神的灵敏性。其次是世俗讽刺小说，象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清明时节》等，或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描写人物，突出人物灵魂中卑琐可笑的方面，或在不露声色的描绘中隐含讽刺。再次是抒情和心理小说，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柔石的《二月》等，以细腻大胆的心理描写，表现“五四”退潮后具有叛逆思想的“时代儿女”的精神苦闷和伤感，作品中蕴含着深厚强烈的

感情力量。最后是神话历史小说，如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等，写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对现实生活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无疑有鼓舞作用。

五、中长篇小说的大面积丰收和多位小说巨匠大师的出现。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是一个流派竞争和多样探索的时期，总的说来，小说作家们在突破旧传统和探索新天地中表现得勇气有余而底气不足，具体表现就是短篇小说写得不错，而中长篇小说量少质不高。到了第二个十年，情况就大为改观了，一大批小说作家生活体验丰富，艺术功底深厚，视野开阔，力求从总体上认识和再现社会生活，于是出现了中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据粗略统计，这十年出版的中长篇小说约有一百五十多部。小说巨匠茅盾、老舍、巴金，小说大师叶圣陶、沈从文、李劫人等，一个个都以气吞山河的鸿篇巨制震动文坛，表现出恢宏的艺术气魄和观察社会的独特深邃眼光。叶绍钧的《倪焕之》以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十年中的时代巨变为背景，表现一个知识青年前进的历程，可说是第一部真正成功的现代长篇小说。茅盾这个时期的《蚀》三部曲、《子夜》和以后的《腐蚀》，侧重从政治经济角度，在把握时代性中追求小说的史诗性，表现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的错综，有涵容万象而绚丽多姿的文学风貌。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和以后的《寒夜》等作品，侧重从青年思潮的角度，把人生沉思和民族悲愤结合起来，成为热血青年思想情绪的历史结晶，形成酣畅奔放的风格。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和以后的《四世同堂》等作品，侧重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对故都北京下层市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作一种有幽默味的描写，流露出由于中国古老文化衰微致使国命不振的历史悲凉感。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

雨前》《大波》等作品，分别侧重从乡土风俗、社会思潮、政治风云的不同角度，锲而不舍地表现近代历史题材，以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和气势磅礴的描写，表现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四川的近代风俗史、社会思潮史和政治斗争史，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沈从文的《边城》

《长河》，侧重从“人性”的角度，描写湘西原始民性的人情美，赞美那里带着氏族遗风的古朴习俗，用以对抗现代都市病态文明。总之，这些巨匠大师的作品都表现了现代小说创作在历史哲学和长篇小说美学方面所取得的很高成就。

第三个十年（1937—1949）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成熟转折期。在这十年中，中国革命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而获得巨大进展，发生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为现代小说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带有转折性意义。此时，全国因战争原因而划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种政权性质绝然不同的地区，这两种地区的小说创作也就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一、就创作方法和反映现实的角度而言，国统区小说主要运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反映现实以暴露讽刺为主；解放区小说则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且把它发展到成熟的水平，反映现实以歌颂赞美为主。抗日战争初期，国统区虽然一度出现过一些以歌颂人民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但除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作品，大都缺乏思想深度。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国统区政策发生变化，重点转向反共反人民，解放战争期间

统治更为残暴腐朽，因而这里的作家坚持上一个十年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以其艺术真实性的极大力量，暴露国统区现实黑暗，讽刺国统区的种种腐朽现象。如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淘金记》，对国统区兵役制度的腐败、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而互相争夺，作了辛辣的揭露和嘲讽；茅盾的《腐蚀》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特务统治，以及这种统治对青年们的腐蚀和杀戮；巴金的《寒夜》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群众的悲剧性生活，替那些贫病无告的小人物伸冤；黄谷柳的《虾球传》描写了国统区城市流浪儿童的痛苦遭遇，表现了华南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

在解放区，共产党掌握政权，人民翻身做主人，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创造着新生活，这为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提供了客观条件，因为这种创作方法的主要任务就是肯定并巩固这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主要笔墨用于描写正面人物，表现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解放区作家有条件深入工农兵，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则为成熟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了主观条件。

解放区的小说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歌颂为主，歌颂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伟大变革，歌颂人民群众的觉悟、英勇斗争和翻身解放后的新生活。这样的题材和主题，在中国过去的小说中都是从未有过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歌颂农民群众在民主改革尖锐复杂的斗争过程中，终于斗倒恶霸地主势力，获得真正翻身的胜利，歌颂了民主政权和年青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歌颂了土地改革运动如何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几千年来的旧秩

序和旧观念，歌颂了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和农民力量的成长。柳青的《种谷记》和欧阳山的《高干大》，歌颂了解放后的农民，如何以饱满的热情和踏实的干劲投入到发展生产建设新生活的潮流中去。由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是武装的革命与武装的反革命进行决战，因此这个时期歌颂革命战争的小说大量涌现。这种情况在前两个十年是没有的，因而歌颂革命战争是这十年对现代小说题材领域的最大拓展。主要作品有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孙犁《荷花淀》，刘白羽《无敌三勇士》等，它们写出了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写出了战士的英勇战斗，深刻揭示了人民战争的阶级性质和群众基础。

二、就小说所表现的人物而言，国统区作品仍然主要以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人物为主人公；解放区作品则以农村工农兵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人公。在国统区，政权掌握在反动派手里，作家们没有深入工农兵的客观条件，因而他们只好和前两个十年一样，写自己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人物。例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描写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蒋纯祖、蒋少祖等人，在“一二八”以后的十年间生活，提出了在这动乱的时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问题。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以抗战大后方桂林为背景，写了一群蛰居于此的知识分子孤寂、平庸的生活，和晦暗、颓唐的心境。钱钟书的《围城》描写一群远离抗战烽烟的知识分子在恋爱、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勾心斗角、卖弄虚荣、追逐名利的丑态，是一部新《儒林外史》。老舍的《四世同堂》，通过祁家四代写出市民性格的发展史，批判他们保守、因循、软弱、妥协的弱点，也表现他们在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觉醒与改造。上